

■ 朱小蔓 金生鉉 主编



道德教育 评论 2010

DAODE JIAOYU
PINGLUN
2010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 朱小蔓 金生鉉
主编

道德教育 评论 2010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李宗喜
版式设计 沈晓萌
责任校对 曲凤玲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德教育评论. 2010 / 朱小蔓, 金生鉉主编.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041 - 6136 - 9

I. ①道… II. ①朱… ②金… III. ①德育 - 中国 - 文集 IV. ①G4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1123 号

道德教育评论 2010

DAODE JIAOYU PINGLUN 2010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1259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制 作	国民灰色图文中心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刷 印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数	1—2 000 册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定 价	38.00 元
印 张	19		
字 数	315 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名誉主编：鲁 洁

主 编：朱小蔓 金生鉉

执行主编：高德胜 冯建军 叶 飞

编 委：鲁 洁 南京师范大学

王逢贤 东北师范大学

朱小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
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金生鉉 南京师范大学

檀传宝 北京师范大学

袁桂林 北京师范大学

魏贤超 浙江大学

杜时忠 华中师范大学

戚万学 山东师范大学

黄向阳 华东师范大学

李 萍 中山大学

郑汉文 香港中文大学

黄 藿 台湾中央大学

Monica Taylor 《道德教育杂志》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Dwight Boyd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编 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
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中国教育学会德育论
专业委员会

目 录

德育理论研究

- 教育如何面对个体人的膨胀与公共人的衰落 (1)
- 与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理想的对话 (19)
- 个性：重构本真的德育世界 (28)

公民道德教育研究

- 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 (41)
- 教育转型与公民教育 (54)
- 论公民伦理的内在属性与结构特征 (67)
- 公民教育范式的阈限：比较的观点 (77)

德育文化研究

- 儒家德育的衰落与消亡：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考察 (91)
- 佛教文化蕴涵的道德精神及其道德教育意蕴 (102)

乡土社会与道德教育

- 农村德育的价值逻辑及其自我建构性 (116)

指向留守儿童心灵关怀的学校德育	(129)
-----------------------	-------

心灵与道德教育

失于“心灵”的道德教育	(146)
道德与心灵教育：香港幼儿教育个案研究反思	(156)

学校德育问题研究

论学校德育的走向	(172)
学校德育问题诊断：概念与性质	(183)

博士生论坛

宽容的内涵及教育意蕴	(191)
自我：道德教育的起点	(204)
正当而有效的美善德育	(213)
基于“现代性”批判的德育反思	(229)
做人、会做人与做事：一种对日常伦理观念的分析	(236)

德育研究述评

2010 年道德教育研究述评	(246)
生活德育的研究综述	(286)

德育理论研究

教育如何面对个体人的膨胀与公共人的衰落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高德胜

内容摘要：现代人享受着加速的“解放”，不但摆脱了物质匮乏的束缚，也抖落了家庭、政治与公共生活、道德与人情等阻碍和负担。但这加速的“解放”造就的是三副面孔，即“消费者”、“自恋者”、“旁观者”的“个体人”，而作为“公共人”的人之维度则快速萎缩，“解放”成了剥夺方式，即“解放的剥夺”。面对现代人的这种境遇，现实的教育实际上起着助推的作用，也在制造贪婪、自恋、冷漠的个体人。但教育作为超越性的人类活动，不能只是顺流而下，而要适当“逆流而上”，给这加速的“解放”以适当的反拉力。

关键词：解放 剥夺 个体人 公共人

近代以来，“解放”一词光辉灿烂，关于“解放”的呐喊、奋斗、欢呼一直是那样美丽而动人。让我们心花怒放的解放本身包含价值预设：只要是解放，就是善的、美的。那么，何谓解放呢？所谓解放，就是“从某种阻碍或阻挠运动的羁绊”中解脱出来，“感觉到运动或行动的自由”^①。从解放的含义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价值预设之逻辑并不严密：什么是阻碍或阻挠？一切阻碍和阻挠都是恶吗？感到自由就是真的自由吗？感到自由的同时有没有可能已经滑入一种新的不自由或者被剥夺状态？由此看来，解放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一、“解放”的加速

几千年来，物质条件始终对人构成阻碍和阻挠。现代人的解放，首当其

^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性 [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4.

冲的任务就是解除物质条件对人的限制，使人不再饱受物质匮乏所带来的种种束缚。现代人的物质解放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是思想解放，为物质欲望的满足正名；二是发展生产，为现代人提供无限丰富的消费品。现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倡导节俭，意在为人可怕的“欲望之口”套上“口罩”，而现代社会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约束人的欲望，还对其大加赞赏，甚至还要用欲望激发、创造新的欲望。“现代文明以金钱为最通用的价值符号，以不同等级、不同档次的商品符号来标识人生意义。它要人们相信，你的人生有没有意义，成不成功，你的个人价值是否得到实现，就看你能赚多少钱，你的消费档次、消费品位是怎样的。现代社会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①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物质欲望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消费，即物质欲望的满足已经彻底除罪化，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甚至“欲望不希望得到满足。相反，欲望只希望得到欲望”^②。因为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也就失去了意义，必须有新的欲望，这样生活才不会停滞，才不会失去意义。

现代社会围绕着人的贪欲，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设计，激发它、利用它、制造它。什么构想有利于激发欲望、满足欲望，什么构想就能够大行其道。可以说，贪欲由过去时代令人警惕的魔鬼一跃而成为现时代发展的“永动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现代科技。在我们这个时代，科技成了希望的源泉，成了信仰，成了“上帝”：“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以专门的非个人性的知识为基础的世俗社会，这个社会赋予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如同我们的前辈承认牧师和宗教教义所拥有的地位。”^③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物质欲望，消除了我们对世界的恐惧，使我们在自然面前成为“说一不二”的主人。现代人借助现代科技，甚至找到了一点做上帝的感觉。物欲无罪，物欲不再有压抑的必要，现代科技又能保证创造不断升级换代的物品，现代人已经前所未有地摆脱了物质匮乏所带来的种种束缚，获得了极大的物质解放。

与物质解放相伴随的是性解放，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同一逻辑使然。性欲与物欲一样，都是人的“生理”和“自然”欲望。既然物欲是无罪的，

① 杜维明，卢风．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杜维明先生访谈录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

② [英] 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 [M]．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91．

③ [英] 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 [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

那性欲自然也是正当的。在前现代以前，性总是与生殖和情爱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脱离了生殖和情爱的性是非法的、不道德的。现代性解放运动，将性从生殖目的和情爱关联中剥离出来，“它没有与有性生殖或情爱结成联盟，而且宣称独立于两者之外，断然拒绝对可能给两者的命运造成的影响负有任何责任；它自豪而又大胆地宣布自己就是自身存在的惟一并且充分的理由和目的”^①。在摆脱生殖负担的过程中，科技再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避孕药具的发明与推广可以让现代人充分享受性欲而不用为受孕的可能性分心。而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及由此而衍生的现代性文化则帮助现代人摆脱了“附加”在性上的“情爱包袱”。如今性的自足性，即为性而性，或者说性爱不需要其他理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了文化常规，任何批评和质疑都是徒劳无益的，只能证明批评者的保守和落伍。

与性解放同时发生的是家庭的衰退。家庭衰退既表现在家庭规模变小、结构越来越简单，也表现在家庭的脆弱上。过去的大家庭已经衰亡，取而代之的是核心家庭。但核心家庭也不是终点，“丁克家庭”、单亲家庭、单人家庭的比例正在上升。不仅如此，作为家庭自然延伸的邻里基本上已经消失，家庭的边界内缩到家门之内。如今，家庭比任何时代都容易解体，已经由过去稳如磐石的“石器时代”进入了精美易碎的“瓷器时代”。对很多人来说，从结婚的那天起就已经有了离婚的心理准备，行走在婚姻之间，即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已经变成了婚姻生活的一种常态化趋势。家庭的衰退与性解放的关系相当复杂，不是能够轻易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家庭不再是性行为唯一合法的场所，家庭的重要性也因此降低。当然，更重要的是，家庭——尤其是结构复杂的大家庭，对个体也是一种障碍和束缚，也需要为个体解放让路。

从专制枷锁下摆脱出来是“解放”的本意之一，这是步入近现代以来人们坚持不懈、力求实现的目标。应该说，现代人的努力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人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和公认，一个指标性的现象就是：很少有政府和机构敢于明目张胆地践踏人权、鼓吹专制统治。在现代社会，封建专制的残余不能说已经完全清除，但起码已经不再是现代人的主要束缚。也许是受专制毒害太久、太深，现代人似乎对大型机构和集体生活都有高度敏感和戒备之心，竭力摆脱这类机构和生活形态的控制，走向更为彻底的个体解放。

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 个体化社会 [M]. 范祥涛,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291.

现代社会特别强调隐私权 (privacy), 杜维明认为强调隐私权是“资本主义的特色”, “每个人有一个个人自我活动的空间, 这个空间不能受政府、家庭、父母的干扰。这个空间不能保住, 那么人的尊严、人权就要受到限制”^①。在隐私权问题上, 连国家都要让路, 或者说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个体的隐私权的。脱胎于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的现代国家, 很“知道”节制自己的权力, 多标榜自己是“有限政府”, 否则就有专制主义的嫌疑。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现代国家最关注两件事: 发展经济和保障人权。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 保障人权是为了使个体免遭侵犯, 至于其他事情, 遵循不干涉的原则, 都由个体自己去解决。与此遥相呼应的是, 如今人们对政府和政治的依赖与期望都低于以往, “对大写‘政治’的兴趣 (换言之, 对直接的政治运动、政党、政府的构成和方案表现出的兴趣)、强烈的政治信念, 以及对所谓的传统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 所有这些都在越来越快地消失”^②。参与政治, 对现代人享受物质生活、对维护个人自我活动空间来说, 都是威胁和负担, 所以也成了个体解放需要克服、摆脱的阻碍和束缚。

个体解放加速的另一个标志是, 公共生活也被视为个体生活的障碍进而被抛弃了。鲍曼指出, 从古希腊开始, 人类生活就开始区分“私宅客厅”(私人空间)和“国民大会厅”(政治空间), 后来又出现了“集会广场”(公共空间)。而“集会广场”是“民主的家园”, 因为在这里可以完成“私宅客厅”与“国民大会厅”之间的连通和转变。换句话说, 正是公共空间的存在, 在私人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之间架起了桥梁, 使二者有机联系起来。但如今“对于关心个人利益的任何一个人而言, 在集会广场上聚会以磋商共同利益, 促进并保护这些利益, 越来越显得是在浪费时间与精力”^③。于是, 过去时代的公共空间也开始商品化, 变成了商业场所和快速道路。正如桑内特所言: “现代市民所聚集的地方是购物中心, 而它不具有任何生活共同体的意义, 聚集也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权力。”^④购物中心鼓励的是消费而不是交谈与讨论, 更谈不上公共利益的磋商。而作为“城市血管”的街道提供给人的, 也仅仅是

① 杜维明, 卢风. 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杜维明先生访谈录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180.

②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被围困的社会 [M]. 邹建立,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61.

③ [英] 齐格蒙特·鲍曼. 个体化社会 [M]. 范祥涛,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266.

④ [美] 理查德·桑内特.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M]. 黄煜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8.

一个通道，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人快速通过，结果是“公共空间变成了流动的通道，从而失去了它原本固有的任何意义”^①。就连社区也在衰亡，房门外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雅各布斯认为社区的“头号杀手”是汽车，“高速公路及道路其实反而灭绝了它们本应该服务的社区”^②。这样的指责，对汽车来说并不公平，其实归根结底，不是汽车，而是驾驶汽车的现代人将社区生活作为一种负担和障碍，不愿意过具有公共性的社区生活，才导致了社区的萎缩。

“我们试图生活在私人领域中，我们只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我们自己和亲朋好友构成的私人领域之中就够了。”^③在这种逻辑下，公共空间成了妨碍我们自由的存在，成了个体解放需要克服的对象，除了灭亡或被改造之外，别无他路。当然，现代人也有自己的替代性“公共空间”，比如仿真空间和赛博空间。以电视为核心的电子媒介以快速闪动的图像对世界进行模拟与再造，为现代人建筑了一个仿真（*simulacrum*）世界。全球几十亿人每天同时暴露在电视荧屏之下。但仿真空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它更多地向人们展示的是私人生活叙事，尤其是名人的个人生活甚至隐私和丑闻，而不是公共问题和公共利益。实际上，仿真空间是一个娱乐空间，人们进入仿真空间是为了“找乐”，是为了摆脱现实世界的沉重负担，正如桑内特所言，“电子媒介所满足的需求是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人们更好地了解和感知自己的人格而从社会交往中退缩的需求”^④。换句话说，仿真空间不但自身不是公共空间，还是抽空现实公共空间的手段。赛博空间的逻辑也大体类似：网络虽然给予了我们更多虚拟交往的机会，但也降低了我们在公共空间不期而遇的机会，使我们过上在虚拟空间里“乐群”、在现实生活中“索居”的矛盾生活。更重要的是网络在方便我们沟通的同时，也为我们“脱离沟通”（*out communicate*）提供了技术支持，使我们可以随时将他人“剔除”或“拒之门外”，而不至于成为我们个人生活的负担。

解放加速的另一个表现是对道德与人情的摆脱。道德与人情可以给人以温暖和归属，但也是约束和负重，所以也成了“解放”的对象。“不要与陌生人说话”是现代人的一个基本生活准则。在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则将交

①③④ [美]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6，4，359。

② [美] 简·雅各布斯：《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M]，姚大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42。

往关系建立在职业角色的范围内，避免更深的彼此卷入，每个人都可以躲在“角色防弹衣”里面安享自由。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这些人无所负于人，也可以说无所求于人。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认为自己的整个命运只操于自己手里”^①。在这种竭力避免彼此生命交结的生活方式下，规则和法律的地位前所未有地突出，甚至遵守规则和法律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只要我遵守规则、按法律办事了，我的义务也就到了头，我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昂首走自己的路，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哪怕别人正在经历生死考验。为了配合这种“解放”，我们时代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的好人通常是指关心别人的人，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只关心自己的人；而现代的好人却是指知道如何关心自己的人，与之相对的则是不知道怎样关心自己的人。”^②

二、“解放的剥夺”

在“解放列车”高速奔驰的过程中，现代人的未来面貌越来越清晰：“消费者”、“自恋者”、“旁观者”。现代人加速的“解放”，实质上是使个人从物质、空间、关系等外在束缚中解脱出来，“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以便让现代人过上更加个人、更加自我、更加私人的生活。阿伦特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私人生活具有被剥夺性质，“它依其字面意义代表着一种被剥夺了某种东西的状态，……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像野蛮人一样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③。也许绝大多数现代人都无法认同这样的观点，以为这是别有用心的扫兴之言，但如果解放只意味着放任与张扬丰富人性的一个侧面、一个维度，而另外的侧面和维度则被压抑、毁灭，也是一种剥夺，“解放的剥夺”。

（一）“消费者”

这里的“消费者”，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讲的，不是指在法律上有特定权利和义务的人，而是从人的存在形态上讲的，指的是“以消费物品为生活方式

① [法] 托克维尔：《公共参与和爱国主义》[M] // 谭安奎：《公共性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37。

② [美] 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34。

③ [美] 汉娜·阿伦特：《公共政治生活：行动、言语与自由》[M] // 谭安奎：《公共性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231。

的人”。人有基本的物质需要，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则是对人的剥夺；如果被物质欲望所虏，受制于物质，变成了单纯的“消费者”，同样是对人的剥夺。阿伦特指出，在古希腊，一定的物质条件只是保证公民不再为满足消费所累，以获得参与公共活动的自由，“在这里，占有财产意味着握有一个人自身生活的必需品，因而潜在地成为一个自由人，自由到超越个人的生活，进入所有人共同拥有的世界”^①。也就是说，那时物质财产只是人们获得自由的手段，现在则成了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这难道不是对人的一种剥夺吗？

“消费者”的剥夺，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受制于必然性本身就是一种剥夺。人类脱胎于自然，既有动物的本能、动物性的需要，也有超动物的驱力、人所特有的需要。前者是人和动物共有的“非特异性需要”，后者是人所独有的“特异性需要”。两者相比，“特异性需要高于非特异性需要”^②，因为后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有标志。因此，人要成为人，就要在满足本能需要的前提下，节制动物性需要，否则，就是对“特异性需要的剥夺”。第二，“消费者”以物质为追求，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受到物的包围。“正如狼孩因为跟狼生活在一起而变成了狼一样，我们自己也慢慢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③因为人将自己的力量对象化的同时，对象的力量也会投射到人身上。物性也会向人性渗透，通俗地说，就是人在拥有每一件东西的同时，也被每一件东西所拥有。受到物包围的人不可避免地要根据物的节奏和特性而生活，人性物化在一定意义上是注定的。第三，“消费者”受物质欲望支配，而欲望是无底的，被欲望支配的生命一刻也无法停息，满足欲望的暂时快乐必然被更大欲望的不满足所淹没，麻木、焦虑、痛苦是必然的伴生物，这正是现代人精神不健康、心理疾病丛生的根源。另一方面，为欲望所累所苦的人，对真善美等一切美好的事物的感受力下降，甚至消失，结果是人性中本应该有的美与善、情与爱、精神与灵魂、超越与创造等优秀品质都没有了位置。第四，“消费是一项孤独的行为，这是一种普遍的、无可救药的孤独，甚至在这一行为是和他人一起进行的时候，也是如此”^④。无论我们消费的是什么，消费行为总是个体的，这一特性，即使在一个人声鼎沸的公共餐厅也无法更改。

① [美] 汉娜·阿伦特. 人的条件 [M]. 竺乾威,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49.

② 张岱年. 文化与价值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49.

③ [法] 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 [M]. 刘成富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

④ [英]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 [M]. 欧阳景根,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因此，以消费为存在方式和生活形态的人，割断了与他人的联系，也就是说，“消费者”注定是孤独的。

（二）“自恋者”

国家的后缩、公共领域的消逝、人际关系的松散使得现代人获得了充分的“解放”，可以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地“顾盼自爱”，催生了“自恋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桑内特说“自恋是当今时代的新教伦理”^①。自恋就是对自己的迷恋，就是将自己作为衡量万事万物的尺度和标准。“自恋者”挥之不去、萦绕心头的问题是：“这人、这事与我有何关系？”“对我有何意义？”也就是说，他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安逸与舒适，关注的是自己的主观体验和感受，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在自己的考虑之内，“我关心的既不是神性，也不是人性，更不是真理、善恶、权利和自由，我只关心我自己……而且，我的关心不会多于我自己”^②。在这种逻辑支配下，“自恋者”总是觉得外部世界不够完美，总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自己，“全世界都亏欠自己”，都在与自己为难。

“自恋者”的剥夺，同样是多维度的。第一，“自恋者”的天空“塌了一大片”。“自恋者”迷恋自我，以及以自我为圆心的亲密小圈子，将自己封闭于私人天地或者将公共空间涸透私人气息，导致公共空间的死亡。这样的结局，一方面是解放，另一方面也是剥夺，因为只有公共领域，人才是真正自由而有个性的。“自由意味着既不受制于生活的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也不对其他人发号施令。它既不意味着统治，也不意味着被统治。因此，在家庭，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仅当一家之主，即家庭的统治者有权离开家庭，进入人人平等的政治领域时，他才被认为是自由的。”^③不是一定要贬低家庭生活的重要性，而是家庭确实与人的直接需要和欲求相联系，只能反映人类的一部分经验。而公共空间则与人的直接经历、需求保持一定距离，是人类的另一个世界，包含着不一样的人类经验。“自恋者”的天空塌了一大片，已经没有了政治和公共空间，只能在狭小的家庭空间中自我顾盼，也就意味着受生

① [美] 理查德·桑内特. 公共人的衰落 [M]. 李继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418.

② [德] 沃夫冈·布雷钦卡. 信仰、道德和教育: 规范哲学的考察 [M]. 彭正梅, 张坤,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6.

③ [美] 汉娜·阿伦特. 公共政治生活: 行动、言语与自由 [M] // 谭安奎. 公共性二十讲.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227.

活必然性支配，失去了在公共空间“行走”的自由，被剥夺了在共同世界中一起行动和言说的机会，被剥夺了只有在他人在场才能展现的人类能力。另一方面，“如果说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范围内，那么，公共领域则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①。因为公共空间是一个为所有人所见所闻的地方，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每个人力求显示的不是自己庸常的一面，而是与众不同的一面。“自恋者”以“解放”为名缩回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以俗常代替了公共领域的功绩与卓越，个性展现的机会被剥夺，成了耽于俗事的“大众人”。正如加塞特所言，“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以一种自由而简易的风格，运用自己的精力和坚毅来追求一切转瞬即逝的快乐和幻想，强制实现他个人的意志”^②。

第二，“自恋者”是公民的敌人。公民是一个含义丰富且有歧义的概念，有时候是指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公共人”，有时候又指相对于国家而言的“国民”。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神圣和权威在降低，在与个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国家也在收敛自己的阵线，“国民”身份虽然依然有效，但已经不那么坚硬。如果“国民”意义上的公民还有一定的生命力，那么“公共人”意义上的公民已经是苟延残喘、行将消亡了。公民作为人的一种存在形态，是要依托公共领域的。如前所述，在我们这个时代，公共领域成了“解放”的牺牲品，已经伴随着个体的膨胀走向了死亡。没有了舞台，没有了活动空间，公民衰亡的命运是注定的。“个体是‘公民’最坏的敌人”^③，原因在于公民与“自恋者”（膨胀的个体）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公民是通过公共领域的健康运行来寻求自己幸福的人，对公共事业、公共善、美好社会充满关心。而“自恋者”对公共利益没有兴趣，只关心自身的需要和利益，与公民恰好反向而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有“大众”没有“公众”、有个人自由没有集体能力的深层原因。公众与大众相同的地方在于“众”，即人的群集，不同的地方在于公众是由共同意见、共同利益、友爱与团结联系在一起的。公共意见是经过详细的辩论和讨论而被大家所共同承认的。而大众是孤独、敏感、有消费力、自我中心的人的简单集合，有的只是杂乱无章的个人意见，无法形成共同意见，更没有友爱和团结。与此同时，个人自由成了超级意识形态，结

① [德]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曹卫东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4.

② [西] 奥尔特加·加塞特. 大众的反叛 [M]. 刘训练, 佟德志,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18.

③ [英]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 [M]. 欧阳景根, 译.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2: 55.

果是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下降了,个人自由与集体无能同步增长。问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各种艰难险阻都是个体所无法解决的,让个体孤独地去面对时代的风暴,犹如让个人去抵挡决堤的洪水,这与其说是“解放”,不如说是真正的剥夺。

第三,“自恋者”不可避免地滑向利己主义者。托克维尔指出:“利己主义是对自己的一种偏激和过分的爱,它是人们只关心自己和爱自己甚于一切。”^①从利己主义的这一界定看,自恋与其差别非常小,或者说利己主义是以自恋为基础的,是自恋的深化、恶化。换句话说,自恋与利己主义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的差别。自恋是爱自己,却不一定要损别人;而利己主义则一定是既爱自己,又损别人,或者以损别人的方式来爱自己。在真实的生活,因为资源的有限性、他人存在所造成的威胁等原因,单纯的自恋很难存在,都是与利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利己主义者将他人“解放”、排除掉了,但得到的却是剥夺,因为“纯粹的自我中心是一个迷宫,一条哪里也不能通向的死路,于其中,除了围着自己打转之外,一事无成”^②。不仅如此,“利己主义可以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③,因为道德是人际关系的一个特征,关注他人及其需要,是道德的内在特性和要求,没有他人,或者说他人不被纳入视野,道德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前提。另外,利己主义也是反人性的,用弗洛姆的话说就是“要求实现人与人的结合是人内心最强烈的追求。这是人类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一股把人类部落、家庭和社会集合在一起的力量。没有实现这一要求就意味着要疯狂或者毁灭——毁灭自己或毁灭他人”^④。现代人追求“解放”,结局却是可能而又现实的毁灭,真是莫大的讽刺。

(三) “旁观者”

“解放”的过程将每个人从与他人的命运纠葛中解脱出来,使每个人都能理直气壮地只关心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成为他人命运的旁观者。电子媒介的发达,强化了现代人作为旁观者的角色。因为电子媒介通过信息的消费化,

①③ [法] 托克维尔. 公共参与和爱国主义 [M] // 谭安奎. 公共性二十讲.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136.

② [西] 奥尔特加·加塞特. 大众的反叛 [M]. 刘训练, 佟德志,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142.

④ [美] E. 弗洛姆. 爱的艺术 [M]. 李健鸣,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16.

割断信息与行动的关系、将他人的遭遇作为娱乐的作料、苦难的饱和曝光等^①，时时刻刻锻造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旁观者。作为旁观者，现代人确实摆脱了人情和道德的种种“包袱”，一身轻松。但从古到今，旁观者始终不是人的正派形象，是对人的一种剥夺。

“旁观者”的典型特征是对自己道德责任的否定。旁观者之所以可以“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他人的苦难与悲惨，就在于旁观者“理直气壮”地对道德责任的否定：他人的苦难与悲惨与我何干？我不恶意伤人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人是道德存在，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还认为自己是人，就必然为自己做道德辩护，公然放弃道德，实际上就是公然放弃做人的资格。“旁观者”公然宣称他人的苦难和悲惨与自己没有任何干系，可以作为娱乐自己的谈资和笑料，这是“解放”呢，还是对人性的剥夺？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孤悬于世的生命，而是融他人于自身的关系性存在，旁观者否定的恰恰是人的这种本性。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等多种原因，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正在加剧，但从人间感情的角度，“人类居住的星球正在冷却”。“人们是如此的冷漠，他们早已忘记了人与人共同相处时的温暖，忘记了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好运与希望所获得的慰藉、舒畅、鼓舞甚至只是平常的愉悦。”^②

我们在旁观他人的命运起伏，反过来，别人也在旁观我们的命运波折，旁观是相互的、普遍的，结果是“旁观者”无可救药地孤独。有一句广告似乎道尽了现代人的骄傲与悲哀：“如果你知道要去哪里，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问题是，你真的知道要去哪里吗？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也意味着全世界都会对你不理不睬！我们生活在茫茫人海中，但这人海是沉默不语的，既干预你，也不关心你。“无论你兴奋也好，忧伤也罢，生也好，死也罢，都无法在这浩大的人海中激起一点涟漪！这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孤独，一种透彻骨髓的孤独。”^③就连被个体当做负担“解放”掉的国家和社会也反过来抛弃个体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愈缺乏经济、军事与文化的独立基础，其代言人就愈会不厌其烦地指出，个体必须依靠自己，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维持个人收支平衡。简言之，个体只能立足于自身，这被认为不仅必需，而且是

①③ 高德胜. 道德教育的时代遭遇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5-8, 96.

② [英] 齐格蒙特·鲍曼. 寻找政治 [M]. 洪涛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43.